

从“巨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

骆 承 烈 编 写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从“巨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主编

略承烈编写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济南

从“巨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主编
駱承烈編写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经二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2960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3 3/8·字数 84,000

1959年10月第1版 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统一书号: T 11099·103

定 价: (5) 0.24 元

目 次

“巨野教案”	1
一 清末的社会经济状况	1
二 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与教士教民的横行	4
三 中国人民初期的反教会斗争	15
四 “巨野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与经过	16
五 “巨野教案”后清政府的媚外措施	26
德占胶澳	32
一 胶澳的形势与沿革	32
二 德寇对胶澳的无理占领	34
三 德占胶澳后，其他特权的进一步获得与 对胶澳的殖民统治	45
四 德国对胶澳港的建造与对胶济铁路的修筑	51
五 德占胶澳后，山东人民的抗德活动	54
附 英占威海	59

义和团在山东	64
一 义和拳的渊源与演进	65
二 从义和拳到义和团	68
三 义和团的組織与活动	72
四 义和团在山东的活动	87
五 袁世凱对义和团的血腥镇压与义和团 活动中心的轉移	95
六 結束語	101

“巨野教案”

“巨野教案”也叫“曹州教案”，是在1897年发生在山东省曹州府轄境巨野县磨盘张庄的一次教案。它是因为中国农民受外国传教士及中国教民的压迫不过，憤而杀死德国教士而发生的。这虽然是一件并不太大的民教冲突，是清朝末年屡見不鮮的人民被中外反动派残酷压迫而不得已的一次反抗行动，而德帝国主义却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大举侵略。教案发生不久，就出兵占领了青島，后来又取得修筑胶济铁路、开矿等特权，使山东成为它的势力范围，插足到中国进行搶劫。因此对于这一次似乎規模并不太大的教案还是有着深入探討的必要的。

一 清末的社会經濟状况

自从1644年滿族入关以来，开始了以少数滿人对多数汉人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残酷統治。清朝統治者，規定了一些統治人民的政策：除在政治上、文化上制造了民族牢獄、酷吏統治，使人民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被牢牢地束縛住之外，在經濟上更对人民极尽压榨之能事。在其全盛时期，由于政府的地丁錢粮、地主的地租劳役、各种名义的捐稅徭役，层层

地压在百姓身上，已使人民难以生存下去，“而自1840年鴉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所付给英国的赔款，大宗的鴉片消耗，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溢，外国竞争对地方生产的破坏影响，全部国家行政机关的腐敗——这些情形就引起了两种结果：旧捐稅更加繁重难以負担，旧捐稅外又加上新捐稅”^①。1840年的鴉片战争，英国首先用大炮打开了旧中国古老的大门，其后，各国侵略者相繼侵入中国，更使清政府国力衰微、腐敗不堪。广大人民除負担供腐朽反动的清政府日益增多的奢侈揮霍外，还額外地負担着清政府对外屢次战败后給外国的巨額賠款。政治上不但受清皇朝及其各級官吏日甚一日的残酷統治，还无端地受着外国侵略者的压迫与凌辱。1851—1864年以反滿为主要目标的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是一次代表中国人民对压迫者的激烈反抗。但由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及农民階級本身具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弱點，又加上中外反动派的合力鎮压，使它終究归于失败。但是，先烈們的鮮血沒有白流，他們的牺牲流血无疑地給了中国人民以极大影响。此后，各阶层人民从各个不同角度出發，发起了各种形式的反清运动，以及在各国侵略者进一步侵略的新形势下的反帝运动。十九世紀末年，与地主士大夫階級維新变法运动几乎同时，繼1870年“天津教案”后，1897年就发生了成为德国占領青島借口的“巨野教案”。

^① 馬克思：“中国的和歐洲的革命”（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第四十二頁）。

清帝国到了十九世紀的末叶，即到了其垂危的几十年間，已腐朽的不成样子了。这个庞大顛頂的“天朝上国”，事实上在政治上已变作了各国帝国主义共同在华的代办所，經濟上已成为各个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敲骨吸髓的一个收稅机关。例如甲午战争后的清帝国，几年內就借了外債三万万七千万两銀子，除按照“馬关条約”交給日本两万万五千万两的賠款外，剩下的一万万二千万两，很快地就为各級官吏貪污、浪費、吞蝕光了。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仅八千万两，但支出方面，只軍餉、洋务、債息就要耗費七千多万两，剩下的仅仅几百万两。再加上国用常經、京餉、旗兵餉需及內务府經費，約二千万两，这样每年就缺少一千多万两。弥补的办法：一方面增加厘金稅，加深剝削工商业者；一方面还要漕米折价，用高价对农民进行剝削，还对土药、茶叶、糖、盐、烟、酒加稅。又用扣廉俸，裁陋規的办法，扣取各衙門營私舞弊的陋規。而各衙門的貪官污吏决不甘愿自己吃亏，他們很快的又用其他的名义来征收了去。結果，旧的陋規沒有除去，新的陋規又增加了。苛暴的捐稅花样翻新，名目繁多，人民拚死掙扎也負担不起。苛政的結果，又促成广泛的水旱天災。如1855年（咸丰五年）黄河自河南的銅瓦箱改道流入山东后，两岸堤壩不牢固，經常泛滥成災，广大人民飽受其害，而治河的各級官吏，却吃的大腹便便，肚滿腸肥。他們侵吞河款，使堤工草率，經常潰決。潰決后又以搶險堵塞的名义，領得額外經費，飽入私囊。如自1898年起，接連几次大決口，直隶、山东沿河居民被淹死的十

六、七万，田地、房屋的損失更是无法計算。同时北方各省又赶上几年大旱，农民連草根树皮都吃不到，直至卖儿鬻女，凄慘之状，令人目不忍睹。

自从鴉片战争以后，英、美、法等侵略者相繼入侵中国，并压迫清政府与其訂立不平等条約，接着西欧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竞相与清政府訂立新的条約，参与对中国的宰割：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英国曾借口“馬嘉理事件”取得干涉云南与緬甸通商事务和勘察西藏到印度道路的特权，帝俄利用“伊犁交涉”取得东北的特权，法国在侵略越南后，挑起了中法战争，日本从吞併朝鮮起，挑起了中日战争。他們从各个战争和交涉中，不仅压迫清政府向他們低头屈服，还割去很多中国的領土，勒索了一些賠款，掌握了清朝的关税、航运、铁路等经济命脉，把中国变作他們收購原料和傾銷商品的市場。外国商品的輸入，意味着中国手工业的破产。大量洋貨輸入的結果，使中国手工业工人的生計事业为他們“十夺其九”。尤其以后铁路的建成，更便于洋貨輸入，加速了中国手工业的破产。广大农民的血汗錢，被侵略者的魔爪夺去，中国人民的生活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因而引起了对外国侵略者强烈的憎恨和反抗的情緒。

二 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与教士教民的横行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侵略的三大法宝——商品、大炮、传教士——也同样施用于对中国的侵略上。即各个侵略者除有

着上述的軍事侵略和經濟侵略外，还在中国照样利用了其御用的工具——宗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

宗教是一定經濟基础所产生的一种上层建筑，是在一定时期內，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現象的不正确的反映。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①，列宁說“宗教是一种最下等的精神酒类”。这都說明了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基于原始人的歪曲的、空想的、虛幻的世界观。“宗教信仰是超自然的、荒誕的、亦即非真实的实体（如神、天使、魔鬼等）的存在；这些非真实的东西，是在自然界的自发力量面前束手无策或被社会压迫所摧殘的人們的幻想所臆造出来的”^②。当它产生的时候，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它最初对被压迫者是一种安慰，但同时，任何宗教一开始都只是給予被压迫者空虛的安慰，使被压迫者安于服从，要他們与各种統治阶级和平共居，即一开始就有着它的局限性。而一旦为統治阶级所掌握利用，就更加成为其压迫和麻痺人民的有力工具了。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它是被資产阶级利用为資产阶级服务的。它向广大劳动人民宣传恭順、忍耐、服从，要被压迫者将希望寄托于渺茫的来生，以利于其反动統治。同样，它如果被帝国主义用于对外侵略的事业中，則更会变作其有力的侵略工具。来中国的传教士，他們自称“体上帝好生之厚仁”、“宣明救世之大道”^③。甚至在侵略者压迫、宰割中国的不平等

① “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

② 康士坦丁諾夫：“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第406頁。

③ 見李提摩太：“政教善章合选”、“防松釋疑說略”。

条約里，也冠冕堂皇地写着，他們到中国来，“原为劝人行善”①，而实际上，却是假借宗教为名，无恶不作。如有的勾結官府、搜集情报，有的包攬詞訟、魚肉乡民，有的更进一步策动中国的官僚买办，讓他們进行卖国勾当，負起其坐探間諜的任务，企图达到淪中国为他們殖民地和保护国的險恶目的。

远在唐建中二年，就有大秦景教（即基督教的前身）传入中国，到了元代至元二十七年，羅馬教徒若望高末諾出使元时，得到元政府許可，在北京开始建礼拜堂。到了明代万历八年（1579年），就有意大利人利瑪竇、德人湯若望陸續到中国来传教，但那时一則刚刚开始，二則传教人数較少，所以信徒不多，影响不大。滿人入关后，清政府封湯若望为欽天監，允許在京师传教，所以康熙初年，基督教曾經盛极一时，全国教徒，不下数十万。雍正、乾隆以后，因政府禁止，逐渐衰落。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約”及中法“黃浦条約”中，已允許外国人在中国传教，而自1860年英法联軍之役后，英法与清政府增訂的条約中，則再次強調“仍准教上传教”及“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并且这些来到中国的“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②明文規定以后，英、美的耶穌教也仿效法国，沾到同样利益，跑到中国来借宗教为名进一步进行侵略了。

在对中国进行宗教侵略的过程中，法国最初是个急先鋒，

① 1858年訂立的“中美天津条約”第29条。

② 見中法“天津条約”。

因而它在最初就享到最大的特权。德国在列强对于中国的争夺中，却还是后进的一个，他在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并未大露头角，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才开始加入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竞赛行列。这当然不是说明这个帝国主义心慈面软，而是因为德国统一较晚（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才开始统一），还无暇过早地跑到遥远的东方进行侵略。但在19世纪末叶，德国统一了，国势强盛了，同时世界上的殖民地也叫英、法等帝国主义分割殆尽了，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虽然从非洲得到一点破碎的殖民地，但只是微乎其微，不可能与英、法抗衡，因此德国就不得不跑到古老的中国找寻他的猎物，于是在羣兽争噬中国的过程中又增加了这样一个新的豺狼。

德国自从1861年侵入中国，和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后，就开始对中国染指。1883年（光绪9年）后，德相俾斯麦采取殖民政策，“正在利用宣教师”，而积极扶持德国教士在山东传教，使法国传教的专权被破坏了一部分。

本来德人安治泰在光绪初年就入山东传教，光绪十二年，被罗马教皇及法王任命为山东南部牧师长。德国排挤法国势力以后，安治泰回到柏林。俾斯麦给他优厚的待遇，许下以后传教事业，由德国政府殷勤保护，并且建议将山东南部的天主教会改置在德意志帝国的管辖之下。安神父欣然应允，所以在山东南部的天主教会，一概属于德国统辖之下。

当时，在山东传教者有很多国家的传教士。如德国、比利时、瑞士、波兰、捷克、奥匈帝国、美国、帝俄、荷兰等

国，但其中以德国人为最多。1839年，教皇額我略第十六派罗类思主教管理山东全省事务，1885年，教皇良第十三又派安治泰主教分理山东迤南一带的教务。1895年，又以烟台一带分派常主教管理，于是山东就分成北、东、南三个教区。北境总堂在济南府，教友一万八千余人，外国教士十三人，中国教士十五人。东境总堂在烟台，教友一万一千余人，1894年，才設主教一員，計有外国教士十二人，中国教士二人。南境总堂在兖州府，教友一万六千余人，1885年，才設主教一員，外国教士三十一人，中国教士十一人①。

南境的轄区是兖、沂、曹、济（即兖州府、沂州府、曹州府、济宁州）四地。当最初德国教士到各地传教时，曾經受到了各地人民的反对。因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一直受着儒、释（佛）、道三教的影响，崇拜祖先，敬奉杂神，而天主教則只讓崇拜一个上帝，无其他神。既不敬祖先，又認為其他一切杂神都是“魔鬼”，到处反对崇拜偶像，遂为广大中国人民（人数最多的还是农民）所坚决反对和拒絕。如当时德国在山东传教的安治泰神父、会长福神父等到农村去传教时，就曾被羣众捉住，反綁双手，身上抹上粪，牵着游街。他們也曾用一些方式来进行传教，如在济宁一带的外国神父，也仿效清人的装束，留长辮子，穿长馬褂、双脸鞋，拿着长烟袋，冒充中国人，到处传教。在过年时还到处拜客。中国人由于感觉到因为外国人的侵入加重了自己的灾难，所以对

① 參看“拳禍記”之山东部分。

于外国人的一些“洋貨”坚决反对与拋棄。如煤油倒在地上也没有人要，鐘表放到地上也没有人拾。还鄙視外国人，如流传着說英国人是鷹头人身子，外国人的腿不会弯曲，甚至有人說他們要人心和眼珠子，沒有这些东西，火車就不能开等。外国传教士面对着这种情况，最初絲毫沒有办法。有的不得已在道旁搭上一个棚，准备点洋葯，主动的給人免費看病；或用其他办法，慢慢地靠近中国人，才不致被擯，而有了以后的发展。

他們在发展过程中，也特別重視了走上层路綫，企图动員“上等人”入教，来扩大其影响。例如早期进入中国的披着宗教外衣的英国侵略者代理人李提摩太，在1876年，就到济南去見山东巡撫丁宝楨，1877年，又到太原去見山西巡撫曾國荃，1880年，又去見前北洋大臣直隸总督李鴻章。可是，这些“上等人”都未“入道”，遂暂时达不到其过問政治、扩大影响的目的。同时，不仅百姓反对，当时一般的官僚也是对洋物采取坚决反对态度的，不但視洋物为怪物，也相信外国教士摄取人精及外国教士窃取嬰兒脑髓之說，对他們的事业也并不贊助，認為是“邪物洋教”。甚至义和团起义后，慈禧太后还相信洋教士挖眼取心，配成葯剂之說。如有的外国人說他們到中国来是为了救济穷苦人民的，慈禧太后則回答：“如果真正悲天憫人、救济穷苦、收养孤儿、医治病人，何不在其本国，而来中国？”这种見解，当然十分膚浅，但实际上教士們却真的不是到中国来“拯救世人”的。广大中国人民对他們的反对及对洋貨的坚决排斥态度，固然是由于封建統治阶级长期閉关自守，而使人們存在的狹隘思想、及由此而产生

的排外性，但主要是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的结果，尤其是人民这种反抗情绪中也包含着浓厚的民族自尊心与纯洁自发的爱国热情，和以排外来巩固其反动统治的清政府的动机是绝对不能相提并论的。

試問为什么汉朝的佛教、唐朝的摩尼教、景教、宋朝的犹太教等传入中国，都没有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而这时候却是教案及排外事件层出不穷呢？究其原因，正如列宁所说：“那些到中国只是为了获得贩卖毒害人民鸦片权的人，那些的善地以传布基督教来掩护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能不憎恨他们吗？”①

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些洋教士们在中国境内，简直是无法无天的洋恶霸，其横行的劣迹，到处皆是，今择重要例子简述如下：

（一）霸占田产：自从“天津条约”締結后，因为外人可以入内地传教，而到处霸占田产，設立教堂。如見到华丽的房屋，就指为是康熙年間的教堂，訛詐过去。較大些的公所、会馆及庙宇，也本着同一理由，訛詐到手里。对百姓的房地，更是巧取豪夺，方式有着多种多样。如果不給他，則雇一个流氓，和他訂立契約，串通地方官吏，卖给教士，而屋主什么也得不到。如济南布政司大街的日升栈，本屬临沂馬姓，有一天，一个洋人和一个流氓在栈里逛了一趟，过了

① 列宁：“中国的战争”（見“列宁斯大林論中国”，人民出版社，第十六頁）。

几天，忽然有人来催他们腾房子，说他已经以八百两银子卖给洋人了。该家打官司从历城县到济南府，到山东巡撫衙門，从1904年到1910年六年的时间才结束。因为中国官吏怕洋人，所以结果馬姓用一千两银子（八百两加二百两利息），才把房子向洋人贖回，这还是馬姓行賄的结果。連打官司带行賄，结果把一个日升棧全部卖光了。

（二）包攬詞訟：遇有民教冲突时，虽然他们高叫什么“訊官应守法如山”，对教民“决不稍循情面，略存姑息”，以使“严防教民挟持紛爭”^①，但是，入教教民，凡因婚姻、田产而訴訟时，教士就到官府去說情，不管教民犯了什么罪，他也硬要官府和平了結。例如河北宣化县有个恶霸张天龙，搶去人家的女儿，逼死姑娘的父亲，但是犯罪后“奉了教”，遂得到了教堂的保护，大搖大摆地回了家。在山东也有类似的例子。假如告到官府后，“民控教則拘传不到，教控民則挾制忿爭”。因为官吏怕洋人，多压抑平民，袒护教民，遂使人民有冤难伸，这就难怪“百姓始而抱怨，繼而成恨，終且成仇”^②了。

（三）侵犯主权：以統治者自居的外国传教士們，根本看不起中国的主权，他们不仅公然违背清政府的法令，甚至竟敢冒充清政府官长。如山东的传教士，冒称巡撫，向地方官下命令，要他们服从教堂的指示。1899年，清政府又为了

^① 見“防訟釋疑說略”。

^② 見1901年“北京主教樊國樑告示”。

适合帝国主义的意旨，拟定了“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规定总主教品位与总督、巡撫相同，大司鐸、司鐸（神父）与司道、府、厅、州县各官相同。各官员接待教士，須“按照品秩，以礼相答”，并且规定地方官所接見的教士，均應“泰西人充當”，中国神父仅是“帮同传譯”，并没有权力^①。又如山东邹县的教堂竟私設关卡征税。教主們侵犯中国主权的过甚，連当时十分媚外的总理各国衙門也不得不說“似此无理已极，情实难容！”

（四）残酷盘剝：外国传教士，不但在政治上享有特权成为高压在人民头上的“洋老爷”，在經濟上也对广大农民尽情盘剝。有好多教堂拥有一些田地，教士們坐收租米，不劳而食。有的也大放高利貸，如巨野的神父每逢麦收季节，就凭着自己雄厚的資本，到集上大量收購小麦，甚至赶着大車到农民家里去收購。到第二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再借給农民，一般的利息都是一倍半至二倍，有时还要多。

除此之外，又有的借端勒索，逞凶杀人，有的强占人妻，有的侵吞人产，抗捐不繳，抗粮不完，甚至杀人放火，清政府也不敢过問，更有的搜集情报，兼做間諜、情报工作。如裨治文曾替美国訂立不平等条約，樊国樞曾向八国联軍探听消息，丁韞良曾替各个侵略者策划“以华制华”的統治方針，德天賜曾向法国送去中国地图……这一切一切卑鄙肮脏的行动，正如耶穌当年形容異端一样：“把一座祷告的殿，变作

^① 見“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七。